

# 评介 义文先生的新著

## ——《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

步 平

---

---

今年2月27日,即在日本文部科学省4月3日对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做出审查合格意见前一个月, 义文先生出版了他的新书——《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sup>①</sup> 这部专著对日本的教科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现行教科书的“改恶”的原因,对右派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的活动及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中的责任等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这是日本进步学者对日本历史,特别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冷静深刻的思考,也是声讨右翼势力掩盖侵略战争责任的行为的檄文。

### 一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状况

由于 义文先生的书是面向日本读者的,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理解,在正式评介 义文先生的新著之前,我想把有关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情况简要说明一下。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从1948年开始逐渐从“国定”向“审定”转变,即原来政府把持的编写教科书的权力逐渐向民间转移,学者可以自行编写教科书,但是,学者编写的教科书须提交文部省审查,审查合格者可在出版社发行,学校根据自己的愿望从审定合

---

①〔日〕 义文:《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学习之友社2001年2月27日出版。

格的教科书中选择需要的一种。文部省设立教科书调查官和教科书审定审议会,对提交的教科书稿本进行审定,审定的原则是文部省制定并数次修改的《学习指导要领》。<sup>①</sup>

战前和战争中,日本的教科书是进行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国体”教育和“皇国史观”教育的主要工具,是向日本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工具。战后,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一直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妄图恢复教科书的旧面貌,对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趋势耿耿于怀。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右翼和保守势力分别两次对教科书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而日本的文部省也逐渐强化了对教科书的审定。但是,日本的和平进步力量依据日本的新宪法与《教育基本法》,也为改变教科书的面貌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特别是以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从1965年起同日本政府与文部省持续进行了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促使了教科书的“改善”。9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在数字问题上有差异),连小学的教科书也有6种教科书予以记载(共7种);日本高中的23种日本史教科书都已经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问题,世界史教科书中也有8种加以记载;多数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和1种初中教科书开始记载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暴行。可以说,这是战后教科书在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上出现的最好的局面。但是,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正是针对这一局面向教科书发起了第三次攻击。

第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到2000年,斗争的焦点集中于送交文部省审定的即将在2002年使用的8家出版社的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上。

<sup>①</sup> 日本关于教科书审定的方法和原则有许多规定,可参照德武敏夫:《教科书的战后史》,新日本出版社1995年10月30日版。

在这其中,有7家出版社送交的是现在正在使用的1997年版的教科书的修改本,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在进步力量的斗争下“改善”了的教科书的修改本。但是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压力下,这7家出版社修改的稿本在许多涉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的记述上比原来有明显的退步。如1997年版教科书中,有6种教科书明确记载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当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新版的教科书送审本中,却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还保留了这一记载。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记载,1997年版的7种教科书全部记载了那一事实,而新版的教科书送审本保留这一记载的只剩下3种了。另外,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关于侵略行为的记述,2002年送审本与1997年版教科书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被日本学术界称为“教科书改恶现象”。<sup>①</sup>

第8种教科书的问题更为严重,这是由日本扶桑社(《产经新闻》的背景)新提交的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是专门与教科书的“改善”趋势唱对台戏,动机和性质都十分恶劣。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是1997年成立的右派组织,是近年来日本社会流行的“自由主义史观”在教科书问题上实施具体行动的组织。这一组织成立的目就是要编写一部在他们看来能够反映“光明大日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的教科书。所以他们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也包括“公民”教科书)不仅是“改恶”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彻底违背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宣扬战争时期日本的“皇国史观”的右翼思潮的代表作。

上述8种教科书,都在2000年4月移交日本文部科学省审

<sup>①</sup> 关于教科书“改恶”现象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拙文“关于日本的教科书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查。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凡是提交审查的教科书稿本均应印成不注明著者和出版社“白皮书”,而且不得外传。7月,媒体披露了7家出版社的新历史教科书修改稿本的内容,人们终于了解了教科书的“改恶”状况。而出版“编纂会”教科书的扶桑社,为了进行鼓动宣传,则主动将该教科书的内容透露出来。于是,关于教科书问题的争论与斗争更加激烈,形成日本战后历史上对教科书的第三次攻击的高潮。文部科学省的审查本来应当在2月末结束,3月10—20日左右公布结果。后来推迟到4月3日。义文先生的新著就是在斗争白热化的2月27日出版的。

## 二 义文先生的新著——《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

义文先生认为上述7种教科书的“改恶”和“编纂会”新编写的教科书对于日本的青年一代的历史教育来说,都是很“危险”的。

(一)在第一、第二两章中, 义文主要指出了上述教科书的主要问题。

关于前7种“改恶”的教科书, 义文根据资料将每一种教科书1997年版和2002年版的内容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发现其中关于侵略战争责任的观点的叙述有很大的转变。这些转变主要是删除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大大后退”,“取消了关于‘三光’作战和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关于冲绳作战的记载后退”,“‘侵略’一词的使用减少”,“关于侵略殖民地对亚洲加害的记述后退”等。关于发生这样的“改恶”的原因, 义文指出:7家出版社在有关问题的记述上发生同样的转变,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日本政府和文部省向出版社施加压力的结果。

他认为,日本政府保守派要员多次就教科书问题发表意见,1998年6月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大臣町村信孝在议会的答辩,

1999年12月从首相官邸打给出版社的电话内容,都是政府向出版社施压的证明。他指出,教科书的“改恶”将会断送日本战后进步国民运动的成果。

关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送审本,义文认为是更加严重的事态,因为这种教科书公然违背日本宪法,肯定侵略战争。义文先生首先指出该教科书在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即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问题。该教科书在前言中称“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说学习历史的目的是要学习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这是为在书中大量地使用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狂热地宣扬“皇国史观”和“神之国”的观念,为否定东京审判的结论制造理论基础。义文先生归纳了该教科书在篡改历史事实方面的情况,即:

1. 否认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队的阴谋和对中国侵略的性质,把卢沟桥事变和“上海事变”的发生都说成是中国的挑衅。
2. 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自卫”战争,“大东亚战争”,完全站在战争时期的“皇国主义史观”的立场上,称:“把日本说成侵略是战后历史的误会。”
3. 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被害”,而掩盖甚至否认日本军队的加害行为。关于强抓中国和朝鲜劳工的问题,根本没有记述,而关于南京大屠杀,只在讲战后的国际审判时从否定论的立场上提到。
4. 蔑视亚洲各民族,美化日本的殖民地统治,称侵占中国东北是在中国大陆建立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近代国家,合并朝鲜是为保卫东亚的安定。
5. 宣扬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论,鼓吹日本国家和日本文明的优秀性,把有关日本起源的神话传说写入教科书。

(二)从上面对8种教科书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对侵略战争历史事件的描述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而“编纂会”的教科书在篡改

历史方面特别严重,其立场简直与战争时代的军国主义者毫无二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编纂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又是如何活动的? 义文先生在第三、四章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第三、四章,作者介绍了战前和战中日本教科书的情况,指出当时的国定教科书以天皇的“教育敕语”为指针,目标是在青年一代中建立“神国”观念和为天皇献身的思想。日本战败后,教育制度发生了变化,在东京审判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下,“皇国史观”失去了绝对的权威地位。但是,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在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上,围绕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批判,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义文先生将这一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 战后初期,从 1946 年起到 1955 年左右,日本的教科书多数记载了有关日本侵略的事实,如南京大屠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

2. 1955 年起,日本政府制定的教科书的审定标准和“学习指导要领”发生根本的转变,规定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对大陆的进出”,为掩盖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定下了基调。而根据新的教科书审查制度,80% 的教科书被认为“不合格”。这被认为是对教科书的“第一次攻击”,结果是导致了持续 15 年左右的教科书的“冬天的时代”。

3. 1965 年家永三郎抗议文部省的审查向法庭提出诉讼,1970 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家永胜诉后,文部省的审查有所缓和,教科书关于日本侵略事实的记载有所改善。从 1974 年起,部分中学和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开始有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以后记述日本侵略罪行的教科书也越来越多。

4. 日本的保守势力对教科书的变化感到危机,从 80 年代初开始了对教科书的“第二次攻击”。文部省再次强化对教科书的审

查,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以及冲绳作战等关于日本“加害”的记述。由于这一举动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当时的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表示今后的教科书审查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的感情。家永三郎也同时提出第三次诉讼,明确要求判定文部省的该要求违法。1997年,日本高等法院对家永三郎的第三次诉讼做出判决,判定家永三郎在“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日军对妇女的暴行”等4个问题上的记述是正确的,而文部省是违法的(但仍判定教科书审查制度合法)。经过这场斗争,教科书的内容又有了明显改善。1984年版的全部中学历史教科书和1985年版的全部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问题,以后又陆续记载了从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以及冲绳作战等问题。所以,从1970年起到9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教科书的“改善”时期。

5. 从1996年夏开始,伴随日本政治倾向的变化,对教科书的“第三次攻击”开始了。这一次攻击的势力是在1997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该会以近年在日本流行的“自由主义史观”为指导,广泛吸收日本保守的政治团体和个人、各种右派组织和极右势力、自民党和自由党的政治家等,以阻止教科书的“改善”潮流为目标,通过推动所谓的“国民运动”掀起教科书“改恶”的逆流。

“编纂会”打着“爱国”和为了“光明的日本”的旗号,得到日本政界、财界的支持,在各地也得到地方右派势力的响应。通过地方议会表决、市民集会签名等活动,攻击现行教科书的“自虐”和“反日”,给出版现行教科书的出版社施加压力。“编纂会”的骨干西尾干二编写了彻底否定侵略战争责任的《国民的历史》,凭借强大的财力向各地教育委员赠送,施加影响和压力。以《国民的历史》为蓝本,“编纂会”编写了教科书(即扶桑社本),也送到文部省要求审查。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所谈到的教科书审查的结果。这一阶段又

被称为教科书的“改恶”的过程。

6.“编纂会”不仅编写了篡改历史事实、肯定侵略战争、鼓吹“皇国史观”的教科书,而且进一步要促使日本各学校使用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即提出了教科书的“选择权”问题。本来,在多种教科书中选择哪一种使用,日本的历史教师和各学校是有比较大的发言权的。但因为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在日本历史教师中的影响比较大,被“编纂会”视为重要的障碍,所以他们在各地推动将教科书的选择权上收到教育委员会而排斥教师选择权的运动。“编纂会”自成立后就向各地教育委员会赠书、写信,自认为在那里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今后围绕教科书选择权的问题还会有激烈的斗争。

(三)了解了战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曲折过程后,许多人肯定会思考日本的“编纂会”为什么要对教科书发动“第三次攻击”?这一问题的社会深层原因和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义文先生在其著作的第五章中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这里, 义文先生引用了“教育危机”的概念,这是日本近年来使用比较多的名词,也是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所谓“教育危机”,是指近年来日本学校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现象,如学生不关心国家和社会,不遵守学校纪律和社会公德,逃学和暴力行为等等。相当多的学校由于学生强调自我,导致老师不能也不敢管理,秩序混乱,授课难以正常进行。这些现象被称为“教育危机”和“教育荒废”。本来,这些现象是日本社会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学校中的表现,但是“自由主义史观”和“编纂会”将这些问题的出现归咎于教科书,称反映了日本侵略和加害历史的教科书使日本的青年人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反感甚至仇视,必须从改变教科书的记述入手挽救教育的危机。这是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及“编纂会”发动对教科书“第三次攻击”的“理由”。



其实,“教育危机”固然是现实,但是对其社会原因的分析则不能就事论事。

义文先生指出:“编纂会”把“教育危机”的出现归咎于教科书的认识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所以近年来日本许多政治现象与之有密切的联系。从1995年自民党组织“历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开始,到1999年日本国旗和国歌在议会的通过和2000年森喜朗关于“神之国”的发言,其目标都针对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是对教科书攻击的准备,那一“总结”其实是表达了保守的政治家和自民党议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为编写新教科书确定了基调。

本来,用容易联想起侵略战争的“日之丸”作为国旗和日本皇室的宫廷乐曲“君之代”作为国歌,在战后的日本一直有相当强的反对力量。但是,在强调解决“教育危机”的前提下,在“让日本的青年一代建立对国家的崇敬和培养献身祖国的精神”的“大义名分”下,数十年没有解决的国旗国歌问题终于获得通过。“编纂会”认为积极推动在各学校升国旗和唱国歌的运动是解决“教育危机”的巨大成功。

首相森喜朗在2000年5月发表了“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的讲话,虽然遭到国内外的反对,但是“编纂会”全力支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日本人自古以来的信仰,把已经分裂的日本社会团结统一在天皇的旗帜之下。

义文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围绕上述问题的争论的核心还是对战后日本的宪法的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是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否真正反省的问题。因为所谓的“神之国”和与国家神道密切结合的“天皇主权”是在战前由《大日本帝国宪法》肯定的,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已经明确将“天皇主权”转变为“国民主权”,明

确了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放弃战争,实行和平主义的原则。所以,义文先生的这一分析实际上接触到了日本的当代政治发展的动向问题,提醒人们警惕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义文先生认为:导致教育危机和教育荒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日本政府(文部省)的教育政策。他分析说,从60年代开始,伴随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应财界的要求在学校教育中也引进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教材不断增加,加重学生负担。在社会激烈的竞争局面下,日本学生从小就必须拼命努力,难以体会学习的快乐,承受的压力是世界罕见的。这是导致教育危机的直接原因,与教科书的“改善”趋势并无任何关系。那种幻想在教科书中掩盖侵略的事实,掩盖日本人的战争犯罪,掩盖当代政治家的腐败渎职等龌龊事件就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只能培养出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重新犯历史的错误。

(四) 对于“编纂会”篡改历史的活动,森喜朗内阁以及各地方政府的动向是什么? 周围各国是什么态度? “编纂会”在教科书问题上大做文章的目的究竟在哪里? 义文先生在第六、七章中专门分析了这一问题。

首先,森喜朗改造内阁的成员中,有许多是1995年“历史编纂委员会”的成员,特别是文部科学省大臣町村信孝,更是其中的所谓“鹰”派政治家。这些人完全赞同“自由主义史观”和“编纂会”对日本“教育危机”的认识。町村信孝在上任之际就将目标放在修改道德教育和教育基本法和对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施加压力上,提出要对记载了日本侵略活动的教科书进行修正,对“编纂会”提出的上收教科书选择权的要求,他也特别支持。所以,义文先生认为教科书“改恶”活动实际是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

义文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各国,特别是韩国在教科书“改恶”

过程中的强烈的反映。本来,日本政府曾经制定了在审查教科书之际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原则,如果根据这一原则,遭到周围各国抗议的“编纂会”的教科书就很难合格。但是,“编纂会”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围绕取消“近邻各国原则”展开了活动。2000年11月23日,千叶县的“教科书议员联盟”向森喜朗首相和当时的文部科学省大臣大岛提出将“近邻各国原则”“从现在进行的教科书审查原则中删除”的要求书。12月,北海道议会的自民党议员提出《修改教科书审查标准的意见书》,指责当前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是“自虐的、反日的”,要求政府取消审查教科书时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原则。“编纂会”以地方议会为舞台进行的教科书“改恶”活动更是活跃,这在书中都有介绍。

义文先生在第七章中结合近年来日本政治发展的趋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等情况,着重分析了“编纂会”在教科书问题上大做文章的目的。他认为,日本的统治层自海湾战争后一直抱有深刻的危机感,不满足始终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而且对于日本的自卫队不能够派往国外耿耿于怀。但是,无论是挣脱美国的军事保护扩大军事力量还是向海外派兵,日本政府都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战后制定的日本的和平宪法。而和平宪法是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的国民意识之上的。若修改和平宪法,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历史认识。由于战后出生的人口已占日本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对战争的恐惧和厌恶远不及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所以“编纂会”认为通过教科书改变国民历史认识的机会已经到来。而日本近年来的许多活动和议案,也对改变历史认识起了推动作用。如右翼和保守势力鼓动的“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运动,国会通过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相关法案等。在对这些动向进行分析后,义文先生尖锐地指出:“编纂会”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改恶”,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军事大国日本”,就是使日

本获得进行战争的主动权。所以,他认为必须批判危险的教科书。

### 三 日本进步力量对教科书“改恶”的抵制

通过对 义文先生的著作的介绍,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 义文先生对日本教科书“改恶”问题的分析是相当深刻和准确的,同时也表明日本的进步势力一直在对教科书“改恶”倾向进行着抵制。需要指出的是, 义文先生在日本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了相当一批日本进步学者和促进中日友好人士的意见。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进步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活动与斗争的历史简要做一介绍。

#### (一) 家永三郎的诉讼与教科书的改善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几乎成为观察其政治社会变动的晴雨表。不过,对于日本以外的诸多国家的人来说,可能比较注意其“改恶”的问题。因为当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国际舆论往往注意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的动向。但是,“恶”是相对“善”来说的。日本保守和右翼势力推动的教科书的“改恶”过程,实际是对由日本进步力量推动的教科书“改善”过程的反动。

战后致力于日本教科书“改善”的进步势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组织包括有日本教育工会(日教组)、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而就个人来说,当首推家永三郎先生。家永先生从 1965 年起持续同日本政府和文部省进行了 32 年的诉讼,使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记述日本的侵略罪行成为合法的行动,为教科书的正常编写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支持家永先生的诉讼,进步组织联合成立了“支持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委员会”, 义文先生就是该委员会的常任委员。1997 年家永三郎先生的诉讼最后结束,支持他诉讼的“支持

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委员会”改名为“面向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继续进行斗争，义文先生是该组织的秘书长，进行实际的工作。

关于家永三郎先生的诉讼情况，笔者曾有数篇文章介绍<sup>①</sup>，在此不再赘述。但是要强调的是，尽管家永三郎先生的三次诉讼已经结束，但是在教科书问题上针对右翼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目前，由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原筑波大学附属高中教谕）高伸欣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关于教科书的诉讼正在进行中。<sup>②</sup>另外，广岛的民间进步团体针对该县教育委员会的网页上公然出现诽谤中国和否定日本侵略罪行的问题，也正在进行斗争。这些都说明：家永三郎先生的诉讼对日本教科书的改善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深远的，而保守和右翼势力气急败坏地掀起对教科书的“第三次攻击”，正是要抵制家永诉讼取得的成果与影响。<sup>③</sup>

## （二）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再思考推动教科书的改善

总的看来，围绕编写教科书的分歧，主要是如何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这也是战后日本社会一直在争论，或者说是战后遗留的问题。日本的进步力量推动教科书的“改善”，首先面对的就是日本社会正确认识侵略战争责任的问题。

日本的战争责任，应当说在东京审判中就已经确认了。但是有许多遗留问题，如天皇的战争责任，违背国际公约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责任，对亚洲各国的人道犯罪责任（包括从军慰安妇、强

① 参见拙文：《家永三郎和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教科书诉讼案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发表于《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② 〔日〕教科书裁判国际委员会编：《世界报道的家永教科书裁判》，エイデル研究所，1998年10月30日。

③ 〔日〕《每日新闻》，2001年3月20日。

征劳工等)都未予追究。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东京审判的资料没有公开,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深入的追究。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活动,日本国民的普遍的战争责任意识并没有建立起来。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在国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多从“被害”的立场出发,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意识淡薄。70年代后半叶,保存在美国的有关档案陆续公开,而日本的学者从80年代开始得以前往美国查阅那些资料,颇有收获。栗屋宪太郎(立教大学)<sup>①</sup>、田中裕(一桥大学)<sup>②</sup>等从那些档案中发现了美国包庇日本天皇和部分重要的战争罪犯的战争责任的证据,开始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特别是昭和天皇1989年去世之际,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重新思考其战争责任的热潮,日本社会也受到影响。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和化学战的新资料以及日本政府和军队强征从军慰安妇的新资料都有新的发现,特别是由进步学者组成的“日本战争责任中心”在搜集侵略战争罪证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进步团体还通过举行报告会、讲演会和展览等形式,启发人们思考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战后和平运动强调“被害”的问题进行了反省,使日本的和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随着在战后审判中未触及的罪行被陆续揭露,日本的和平运动对强调“被害”而忽视“加害”责任的问题有所觉悟。特别是新披露的那些罪行都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如许多本来对中国的战争受害不以为然的日本人,当了解了七三一细菌部队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的残暴性质后感到震惊;日本违背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并把

① [日]栗屋宪太郎:《东京审判论》,大月书店1989年7月出版;《未决的战争责任》,柏书房1994年9月出版;《现代史发掘》,大月书店1996年12月出版。

② [日]藤原彰等:《彻底剖析昭和天皇“独白录”》,大月书店1996年出版。

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的事实被揭露出来后,许多日本人发现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国民掩盖了重要的历史事实;强征从军慰安妇和劳工的罪行被提交到联合国人权问题的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议,也使许多日本人惊醒。

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再思考和对“加害”责任的觉悟对教科书的编写有很大的影响。

如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1982年文部省的审定意见说:“迄今为止还没有经得起推敲的专门的学术研究,在教科书中使用为时过早”;关于“从军慰安妇”,文部省的审定意见是:“奸淫妇女的事情,在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战场上都有发生,这不是日本军队所独有的事情”。<sup>①</sup>而到1997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则认定文部省对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审定意见违法,写进教科书是合法的,同时判定教科书记述“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也是正当合法的。<sup>②</sup>所以,1997年版的7种中学历史教科书都记载了上述日本侵略和加害的历史事实。

### (三) 对自由主义史观的警惕和批判抵制教科书的“改恶”

日本右倾势力对教科书发动第三次攻击,是以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对于这一情况,日本的进步力量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并引起了警惕。

自由主义史观滥觞于1994年,其代表人物首推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藤冈基本的主张就是: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被“东京审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以及“谢罪史观”歪曲了,自由主义史观则是本着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原则改造日本的近现代史教育。由于自由主义史观产生于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海湾战争

① 《第三次家永教科书诉讼上告理由书》,第四章。

② [日]教科书诉讼辩护团:《支持教科书诉讼全国联络会声明》,1997年8月29日。

发生的形势下，迎合了日本社会思想动荡和混乱的局面，经过几年的经营，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在 1997 年，建立了以自由主义史观为宗旨的行动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于是，右倾势力对战后教育的批评集中到教科书问题上。<sup>①</sup>

日本的进步力量从一开始就对自由主义史观保持警惕，并进行了斗争。

这一时期，进步学者针对自由主义史观对侵略历史事实的歪曲集中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资料。如藤原彰(《南京的日本军》、《日、中、美学者关于南京事件的新研究》)、笠原十九司(《南京难民的百日》、《南京事件》、《南京事件与三光作战》)及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关于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 13 处谎言》)等对南京大屠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吉见义明和林博史(《共同研究：日本军慰安妇》)、荒井信一(《从军慰安妇和历史认识》)、日本的妇女组织(《战犯审判与性犯罪》VAWW·NET) 等都对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质进行了揭露批判，并披露了大量充分的资料；此外，关于三光作战，细菌战、化学战等问题也出版了许多著作。在各种杂志及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1996 年 1 月，日本大月书店出版了《近现代史的真实是什么》，由著名的进步学者藤原彰主编，收集了日本社会有影响的进步学者的 24 篇文章，系统批判了自由主义史观对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歪曲。

在揭露侵略战争史实的同时，进步学者也针对自由主义史观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支持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委员会”组织了对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的系列丛书(家永三郎监修)，对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笼、主张、危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首先向自由主义史观“开火”。此后，中村政则(《如何看近现代史?》、《历史与真实》)、藤野

① 参见拙文：《关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4 期。



丰(《从学校开始的对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天野慧一(《解读自由主义史观》)、城丸章夫和松岛荣一(《自由主义史观的病理》)、佐贯浩(《批判自由主义史观与和平教育的方法》)等都从理论的高度剖析了自由主义史观的问题。

相当一部分日本进步学者意识到,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反映了日本社会战争责任认识的模糊状况,因此结合90年代后披露出来的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新资料,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进行了新的追究和研究。在这方面,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论》、《未决的战争责任》)首开先河,接着,吉田裕(《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责任》)、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渡边贤二(《为了和平的战争论》)、安彦一慧(《战争责任与我们》)、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等人的著作都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和战后掩盖历史责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1997年末,随着“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建立,对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也侧重于教科书问题。针对自由主义史观的批评,今泉龙介(《对“教科书不教历史”的批判》)进行了反论,石山久男(《近现代史与教科书问题》)以及纷纷建立的针对“编纂会”的组织都出版书籍,发表文章,谴责“编纂会”在教科书问题上的动作。在这方面,义文先生是有代表性的。他在1997年就着手编写了《慰安妇问题与教科书攻击》一书,揭露自由主义史观在慰安妇问题上做文章的实质,接着出版了《教科书攻击的深层》,对右翼攻击教科书的手段和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期间,他与其他学者共同就教科书歪曲历史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在文部科学省的审定结果即将公布之前,他的新著《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出版。

#### (四) 追究历史事实的努力和战争受害的诉讼

90年代以来,日本进步力量针对右翼和自由主义史观以及“编纂会”歪曲历史的活动,也针锋相对地成立了研究组织和团体,

以追究侵略战争的事实和进行战争受害的诉讼作为斗争方式。

同右翼进行斗争的组织很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以下一些:

### 1. “面向 21 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

1997 年 8 月 29 日家永三郎的第三次诉讼结束后,原来支持诉讼的“支持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同时宣布结束历史使命。但是,针对“编纂会”出现的新形势,进步的学者随即在 1998 年 6 月 13 日成立了“面向 21 世纪的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该组织继承了家永三郎的斗争精神,在教科书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线。

### 2.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和“ABC 企画”委员会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是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回国的原日本“战犯”的组织。其成员虽然年事已高,但是针对自由主义史观的言论,他们创办了杂志——《中归连》,旗帜鲜明地提出批判自由主义史观的口号。“ABC 企画”委员会则搜集了大量的日本在战争中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罪行资料,制作成比较轻便的展板,从 1992 年以来,在日本各地举办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七三一部队展”和“毒气展”,至今已在 70 多个城市展出。

### 3. “支持中国被受害者要求会”

该组织以协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为目标,有比较多的律师参加,在日本各地有许多支部。与该组织目的相近的组织还有一些。目前在日本提出的战争被害诉讼 60 余件,其中涉及中国的战争被害的诉讼将近 20 件,其他还有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国以及日本的被害人提出的诉讼。根据日本的法律程序,完成这些诉讼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难度也相当大。但是这些诉讼的存在,在日本社会具有“宣言”的意义: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总之是暴露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行。许多进步组织就是这样认识诉讼的意义的。

#### 4. “日本战争责任研究”中心

该组织由进步的日本学者联合组成,开始是针对日本政府否认“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质而进行广泛的资料搜集而联合起来的。以后将搜集资料的范围扩大到日本侵略活动的各领域,特别在细菌战和化学战资料的搜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战争责任研究》季刊。

在日本,还有许多进步团体和组织在对教科书的“改恶”和篡改历史事实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中国的学者需要关注他们的活动,并逐渐建立与他们联系。

(作者步平,1948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 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出版

由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33.8万字,39元)共38篇文章,从五个方面,即:南京大屠杀暴行研究、“安全区”问题研究、日军性暴力和“慰安妇”问题研究、东史郎日记案研究和日本右翼势力翻案活动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把1999年8月和2000年8月两次学术交流会、研讨会中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册。